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的最初足迹

——论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和文艺思想

吴　肇　荣

一个作家的成长及其创作上的成就，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思想基础则往往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鲁迅、茅盾等，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都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从事理论探索工作，为尔后开始的创作活动作了很好的思想、理论的准备；就是在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他们也一直不间断地从事革命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评论工作，使其创作活动有更明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自觉，从而能取得具有时代高度的创作成就。他们是集思想家、理论家与文学家，学者、作家与战士于一身的英才和巨匠，充分显示了新兴阶级革命作家的崭新特色。我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努力继承前辈的这个好传统。他们大都重视对革命理论（包括文艺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注意研究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潮和创作经验，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周立波就是其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作家。

周立波重视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和宣传，重视文艺评论工作，这在他文学活动的早期就表现出来。周立波的写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四年加入"左联"和党组织后，更是自觉地献身于革命文学事业。他早期的文学活动方面较多，当编辑，搞翻译，写诗和散文，并做左联的党团工作，但结合编辑工作从事文艺评论活动，则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可以说他的革命文学生涯是从评论活动开始的；他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收获和文艺评论的成果，是他最初的文学实绩，标示他一生漫长艰辛的革命现实主义征程的起步。探论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作家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而且还能向我们今天年轻一代作家提供有益的启示。让他们看看，我们老一辈卓有成就的作家，在年轻时是如何开始自己的文学步伐的，革命的理论对其成长起了怎样的指引作用，从而自觉地防止和纠正自己轻视理论的思想偏颇。

一

1930年，初涉文坛的周立波，在回答《大众文艺》征询意见的复信——《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每期要发表几篇很精炼很平白的普罗文艺论文，把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① 这个对刊物的希望，正道出了他对理论批评之所以重视的原因及从事这项工作的目的性之所在。加入"左联"后，周立波被组织安排在理论批评战线工作，先后担任《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界》、《光明》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做《生活知识》半月刊文艺专栏的主撰人；他也就在这些岗位上辛勤劳作，为"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的树立尽自己的力量。时值左联后期，当时不仅敌我之间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仍很激烈，就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对诸如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倾向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也还在继续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随着革命文学创作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译介，以及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左联中后期的评论界对上述理论问题，已从以前的一般泛论转向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进行深入的探讨，一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时亦称新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周立波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走进评论界的，他的评论活动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他当时认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上的"新现实主义"，应成为"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内容，革命文学要尽快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作家们就必须在学习和掌握这一崭新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上狠下功夫。基于这个认识，周立波就对革命现实主义作认真的探索和积极的宣传，从而构成了他早期评论活动的中心内容。

周立波探索和宣传革命现实主义，首先从文艺与现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很注重对现实主义根本精神的阐述。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是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真实地描写现实，这是对文艺与现实关系作唯物主义理解，所形成的一种文学观和创作论。周立波为了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当时认真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唯物论思想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并结合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实践经验，特别是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创作实绩，探究现实主义在创作中的具体贯彻。通过这些学习，周立波明确认识到：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文学只不过是生活的反映。他在一组谈文学的特征和感染力的论文中，批评了当时一些人仅仅把文学归结为作家个人情与意的产物的观点，指出文学的根基是"社会"，文学只不过是"用艺术的书叶记录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是实际生活的艺术的反映和认识"。②这个观点，在他与苏汶争论作家的主观和社会的客观关系问题时，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在《理论检讨》、《答苏汶先生》中，针对苏汶对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关系的颠倒，反复论述：从表面上看，文学作品似乎只是作家个人"灵魂"的产物，而其实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由发生到表现，一径是社会的东西，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一定的艺术思想；社会现实以及这个现实中的个人的地位，才是'艺术家的灵魂'的决定的基础"。因此作家头脑中的生活映象，包括他的幻想，"都是从现实出发，永远不脱落现实的根据的东西"，创作"只有渗进现实生活的最深处"，才能达到"作家的主观和社会的客观"相一致，写出真实反映社会实情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以苏汶先生的'自由灵魂'去'修改'客观，有谁能够担保他不歪曲客观"。③由于周立波紧紧抓住文艺与现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来探讨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因而他就能够把从现实生活出发，注视现实本身的"矛盾"和"运动"，真实地描写生活，作为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来强调，明确指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性和真实性，认识和见解是准确的。

周立波不仅从理论上阐述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而且还联系左翼文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展开一系列具体的批评，表现出一个革命批评家的可贵勇气和责任感。我们知道，从革命文学倡导到左联成立，革命文学阵营不管在理论宣传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忽视文艺真实性的倾向。在理论上，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反映阶级意识，文艺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等，宣传得较多，这对于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和坚持革命倾向性，很有必要。但与此同时，对文学创作从生活出发，文学的真实性要求，文学的认识作用等，却有所忽视。因而文艺批评上普遍存在"单单用意识的前进性"来"解释文学感染力的巨大和长久"④，而忽视生活、实践对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在创作上，年轻的左翼作家大都革命热情高昂，而生活基础薄弱，创作往往单纯从配合斗争形势，宣传阶级意识出发，因而较普遍地缺少生活实感，主观臆想色彩较浓，高昂的革命呼唤未能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周立波对

这种情况极为重视，认为在革命文学发展初期，这种情况尽管在所难免，但却必须尽快克服，并从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高度加以分析，探讨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应取何种态度，进一步阐发现实主义根本精神。例如，他就多次以蒋光慈等人的创作为例，分析脱离客观现实，从主观意念出发的创作倾向的弊病，说"这些书的作者，在主观上，常常是想作为真正的革命使徒出现，……但他们大都是小市民式的主观的理想家，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不够防止他们的理想流于空想"；"由于他们的革命理想没有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相互渗透，而成为生活的本来的东西的缘故"，于是，尽管"他们的确给与了文学一种新的精神，替后来的努力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但"因为生活的不熟悉或艺术的感动力不足的种种缘故，这方面也并没有可以长期深印人心的巨大的绘卷"。⑤在这里，他明确把熟悉生活，艺术描写与生活真实相一致，革命理想与客观现实相渗透，一切都要成为"生活的本来的东西"，作为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来强调，尖锐指出，"表现思想倾向，带主观的勉强性，是文艺的失败的最大的根源"，作家"只有对于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事件和情境进行仔细的观察和估量，使自己成为现实活动的有机的一部分，使自己的思维和知觉完全和现实一致"，才能真正克服"主观理想化"倾向，使创作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⑥

在探索现实主义根本精神时，周立波除强调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真实地描写现实，即在反映生活上达到现实性和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外，还着重阐述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特殊内涵，指出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真实性、而是通过对生活现象的逼真描绘，达到反映现实某些本质和规律的真实性。对于这个问题，周立波作出过自己很有独创性的理论概括和表述，这就是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艺术描写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结合。他说："被尊为现实主义最高峰的巴尔扎克，就是以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深刻的认识见长的。有味的是，巴尔扎克的理性的思索，竟能冲破感情的羁绊，使他的描写成为客观的科学的东西，成为经济学上的可贵的事例。"⑦他在论述托尔斯泰等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时，也表述过相类似的见解。在周立波看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种忠于现实，并勇于冲破自己某些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主观观念的束缚，使自己的艺术描写"成为客观的科学的东西"的态度和精神，突出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特点。这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的描写，既要达到象客观生活一样的逼真和生动，又要如科学一样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揭示一定的生活真理，给人以科学性的认识。在这里，周立波指出，两者结合和交融的关键，在于"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关系"，因为它是"社会矛盾及其发展"的体现物；只要作者不把创作的注意力放在缺乏社会性的"个人琐事"上，放在"个人的生物学的激动的要素"上⑧，而是以全力去探求"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深刻的认识"和反映，那么他的艺术表现就能达到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某种程度的结合。周立波的这些论述，对于促使当时一些作家摆脱"自我表现"，克服浪漫缔克幻想，走向社会，直面人生，探求对生活的本质认识和反映，有一定作用；他自己也通过这些理论批评活动，在文艺与现实关系问题上，初步树立了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观念。

二

周立波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宣传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揭示、阐述它的革命性所在。我们知道，从客观生活出发，正视现实并真实地描写现实作为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只反映了现实主义的一般规律，而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主义又都有其特殊性。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它除了具有现实性、真实性特征外，还有自己的革命性特征；正是这三者的结合，才构成

这种崭新的现实主义。周立波在评论活动中，非常重视对这一点的阐发。

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主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兴起的。当时的文学新兴力量，主要是从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汲取现实主义思想。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些作家头脑里，往往容易把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当作现实主义的标本，不能敏锐察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与它的区别，这实是作家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障碍。有感于此，周立波在《一个巨人的死》中，专门把巴尔扎克与高尔基进行对比，让人明确两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他说：“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不情愿地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市民阶级的兴起的十九世纪法兰西社会，那么，高尔基的一切现实主义的著作，是十分情愿地描写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没落和劳动人民的兴起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社会，……。如果说，巴尔扎克是无意识地，用艺术作了历史的雄伟的概括，并且又无意识地制出了市民社会的剥削关系的明快的图解，那末，高尔基在这一方面，是意识地创立了功勋。”⑨在他看来，高尔基与巴尔扎克的区别，就是新旧两种现实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既表现在写什么，即侧重描写的生活内容上，也表现在怎样写，即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价上。

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现实，因而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就会有不同的“写真实”的对象和内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的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领导人民展开推翻旧世界的斗争的新时代，那么它的革命新特色就首先从这个新的描写对象和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来。周立波把这种情况解释为“时代的特征——依照乌拉机密尔（即列宁——笔者注）的意见——就是文学的特征。”⑩从这一理解出发，他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着重表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他们变革现实、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活动。他曾高度评价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现实主义先驱者们“为人生”的文艺思想，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的文学主张是“无限的严肃和崇高的”。但又指出，现实发展到当今，生活又向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深一层的人类历史的课题”，即要“描绘新的更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的真正的主角，工农大众”⑪，使“为人生”的文学有新的现实内容和意义。当抗日救亡浪潮兴起之时，周立波又积极宣传文学“要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切斗争情境，描写各种各样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其“主体”的“劳动大众和他们的斗争生活”，以“鼓吹和推动已发与未发的民族革命的斗争”。⑫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热情称赞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端木蕻良、姚雪垠等反映现实矛盾、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说这些作品的出现，使“中国新文学在发展途中”产生了“稀有飞跃”。但是他又认为，我们描写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还赶不上时代的需要”，“许多现实主义者，只看见了现实的消极面——譬如灾难，还没有把握现实的光明面——譬如一切形式的挣扎”；说“我们渴望作家对于当前飞跃的现实的迅速的把握”，“我们期待着斗争中的中国的更伟大的叙事诗”。⑬这些评论对于扩大革命文学的影响，阐发革命文学新的现实主义特色，起了一定的作用。

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特色，不仅表现在它的新的描写对象和题材内容上，还表现在它要求作家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分析生活，对生活作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上。周立波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的阐述。他曾这样说过：“新的现实主义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执行改造人类思想的最大的使命，才能完成新的现实主义的教育的任务”⑭。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必须掌握先进的世界观，用它来指导创作。他说，“文学

作家是不能超越时代了，那么，许多伟大的作家常常作了下一时代的预言，……这正是因为艺术家的伟大的眼光看到了现实的本质的原故。他们不仅目击了现实的现状，而且细察了现实的发展；不仅看见了今天的光景，而且预窥了明日的生长，这是要有深刻的思想的作家，才能办到的。"⑮所以他多次提醒作家们注意，"为了洞察现实的现象，明辨历史的动向，我们应当熟悉世界和中国的现势，……并不断地学习人类智慧的最大的成就——革命的世界观。"⑯周立波的这些论述，实际上触及到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再现现实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深入分析生活、正确评价生活，就是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上，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生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使之不但说明现在，也预示未来。

为了说明世界观对创作的重大影响，说明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价，往往是决定他走什么创作道路、坚持什么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周立波研究了一系列外国作家，特别是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历程，从中发掘于我们有益的经验教训。他首先评述高尔基的创作历程，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以后，……开始了他的创作前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后来，"他认识了'真正的人间'，并不在这里——并不在这些浮浪者中间，他一定要从产业无产者之中去找这种新的人格；《夜店》的剧本，最明白地表露了这种新认识，表明了他和浮浪人诀别的新意识"⑰，这时他才坚实地走上了新的，即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周立波还考察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创作发展，说它经历了《地狱》、《火线下》、《光明》三个时期；"到了《光明》时代的巴比塞，已经看清了世界的光明方向，已经更进一步完全站在劳动者群众的最前列"，其创作才闪现出新的现实主义光彩。⑱周立波又分析过相反的情况，他说爱尔兰作家乔易斯，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新时代，他"抓不住人间的本质，看不出人民大众的最根本的契机，不理解发展的基本线索，更不知道世界的动向"，因而他的创作也就"与文学应当有新鲜的内容和崇高的目的相违反"。⑲在这里，周立波明确指出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完全站在劳动者群众的最前列"，必须抓住"人间的本质"，必须理解社会矛盾"发展的基本线索"，必须把握"世界的动向"，一句话，就是必须对生活及其发展作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评价，这就把革命现实主义另一个新特色阐述得更具体更明晰。正是这些新特色的作用，才使新现实主义文学有巨大的革命作用。周立波的这些理论思考，为他确立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三

周立波是一个很懂艺术规律，重视文艺特征的批评家。他探讨革命现实主义的现实性、真实性和革命性要求，都是从文艺的特点出发，而最后又落脚到文艺创作的实践上。从文艺创作的实践出发，现实主义的中心环节，就是创造艺术典型。正因为艺术典型的创造，体现了现实主义对于作品思想内容深刻程度的要求和作品艺术形式完美程度的要求，是达到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再现的手段，所以周立波对典型性问题也十分重视，说"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任务"，"表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这种'微妙的、很难捉摸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是新的现实主义者的最大的任务"。⑳

周立波认真考察了当时革命文学在塑造典型方面的现状，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前面，正摆着一个富饶无比的现实，我们正可以塑造英雄的、前进的，或者没落的许多典型。然而我们的文学，除了阿Q以外，再找不出第二个典型。"㉑话虽然说过了一点，但也确实道出了当时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革命文学要提高自己的现实主义水平，必须在典型创造上有所突进；而要塑造成功的艺术典型，除加强对生活的熟悉和理

解外，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握典型的美学特征及其创作规律。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周立波作过比较精细的研究，并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㉒一文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典型人物有如下四大特征：一、“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典型人物的生产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在这里去概括一切不同范畴的人类的抽象的企图，固然不会成功，而一切太依作者的理想的努力，也常常成了失败。”二、“典型的不是现成的，现成的只是一些散漫而暗晦的典型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要极力反对把文艺家当作照相机的理论。……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他们常常把那一时代正在生长的典型和行将破灭的典型预报于大众，……而文艺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在此。”三、“典型的不是偶然的，许多作家常常抓住一些偶然事件中的个别人物，作为典型。这样的描写，常常不但要失去艺术的普泛性，在典型的社会环境中找不到它的根底，而且因为这样，一定抓不住时代的本质，触不到时代的动向，在社会意义上是很少价值的。我们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从许多上层的社会层中塑造否定的典型，……把我们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连贯起来，造成我们的文学典型，这才是不朽的典型。”四、“典型的不是单纯的，许多作家常常把典型人物写成单纯的，机械的东西。……现实中的人物，是饱含极复杂的矛盾的，而且，只有体现着这极复杂的矛盾的典型，才有极大的艺术价值，才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的。”这四条就构成了他典型论的体系。在这里，他首先是从反映社会动向、揭示时代本质，使艺术获得巨大社会价值的角度来探讨典型问题的，把典型与时代的关系提到突出的地位。这就抓住了革命现实主义典型观的核心，使之与旧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划清了界限。也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他才明确提出塑造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积极典型和行将破灭的没落典型，以反映现实的革命发展，是革命文学的紧迫任务。其次，他是用辩证的观点考察典型诸特征的相互关系，指出典型来自生活，是真实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但又不是现成事实的抄录，而应是作家对实生活进行集中、概括的结果；这种集中概括是使生活矛盾趋于本质化同时趋于个性化的过程，决不能是一种消融生活复杂性、磨平生活矛盾的纯化净化过程，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典型的美学特征及其创作规律。

周立波还通过一系列作品评论，探讨了典型创造过程中的具体艺术表现问题。第一，他强调创造艺术典型，是作家创作活动的中心点；作家的一切艺术才华，所展开的一切艺术描写，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否则就没有意义。例如，他曾评论艾芜的《欧洲的风》是“最惹目的”，“令人神往”，“作者显现了对于自然描写的优美能力”，但对其“不能作成典型性格的缺点”，很感遗憾；在评论《冬天到春天》时，说其艺术描写很生动，但又指出它“写了人物的兽性冲动，带有色情狂的苍白的面孔，这是不是现实中的典型，是很成问题的”。第二，他强调创造典型，是一个发掘和反映生活本质的问题，因此在创作上要精心处理好情节的奇巧和生活的必然、追求作品思想的积极性和对生活真实描写的关系。一些作者常常不顾生活本身的逻辑，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巧妙，以取悦读者；或仅仅为了满足一些读者的心理要求，人为地制造不符合生活情理的“积极”结局和“光明尾巴”，这些都是违反艺术典型化原则的。他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一文中，结合作品详细地分析了这类问题。如指出“舒群的风格很明朗，朴素，却缺少含蓄，并不深湛。他最注意情节，……为了要把生活装进一个框子里，常常会把它写成种种奇遇和巧合。奇遇和巧合在人生中当然可能发生，但常常不是普遍的，描写它，很难创造时代的典型。”又说宋之的的《罂粟花开的时候》中的“三娃子……把一个横蛮无理的禁烟委员杀死了，给了读者一种道德上的满足，

但反而冲淡了读者对三娃子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的同情。……《罂粟花开的时候》里的禁烟委员和姚雪垠的《碉堡风波》里的碉堡委员是同样的人物，但我们也许更恨碉堡委员，因为他还活着，还可以作无穷的恶"。从这个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周立波的见解和主张。第三，他强调典型创造不仅要以生活为基础，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地反映生活，更需要对生活有新的开拓和发现，艺术表现上有新的创造。如他对端木蕻良在《遥远的风砂》里创造了黑煤子这个独特的典型，颇为称赞，说它"不但描写了塞外的景色和风习，……最使人难忘的，是作者创造了一个在中国文学里不常出现的土匪的典型的性格。黑煤子是一个带领收编的人们去收编土匪队伍的土匪。……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有许多的缺点，却又有莫大的力。他的一切性情，都是他的生活所铸造，都是那么自然的东西。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常常很单纯。《遥远的风砂》的作者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典型的性格"，很值得重视。这些评论不仅切中当时创作中的弊病，而且对人们理解和掌握现实主义典型观，很有启发意义。

这就是老作家周立波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即艰辛的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留下的最初足迹。我们从他这一段行程可以看出，作家在自己文学活动的早期，通过理论探索和批评活动，已树立了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想，在众多的文学道路面前，作了一次方向性的选择，为自己一生的文学活动开了一个好头——朝着革命现实主义方向进行追求。他在这些理论批评活动中，认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和创作的基础；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准则；通过创造艺术典型反映现实的革命发展，是新现实主义对创作的根本要求，奠定了他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基础。当然这些认识还只是初步的，还缺乏深入坚实的思考和探论，特别是对怎样才能实践革命现实主义这一重要问题，还认识不够明确，尚不能理解作家深入人民斗争实践，获得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是实践革命现实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当他尔后经过抗日战争生活的锻炼和延安整风的教育，在学习马列和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上述思想幼嫩的弱点就得到很好的克服，革命现实主义思想也就锤炼得更为坚实，从而开辟了文学活动的新阶段。

注释：

① 见《大众文艺》第四期，1930年5月。

② 见周立波《怎样看小说》、《文艺的特征》，载《读书生活》第二卷二、六期。

③ 周立波《理论检讨》，《大美晚报》，1935年6月17日。

④⑮ 周立波《文学的感染力》，《读书生活》二卷五期。

⑤ 周立波《中国文学的新发展》，《光明》第一卷。

⑥⑦ 周立波《文艺的特征》，《读书生活》二卷二期。

⑧⑭ 周立波《选择》，《读书生活》二卷十期。

⑨⑰ 周立波《一个巨人的死》，《光明》一卷第二号。

⑩ 周立波《为"国防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答周楞伽先生》，《生活知识》二卷四期。

⑪ 周立波《我们应该写什么》，《读书生活》四卷一期。

⑫⑯ 周立波《我们现在的文学》，《读书生活》三卷七期。

⑬ 周立波《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读书生活》三卷二期、《光明》二卷第二号。

⑱ 周立波《悼巴比塞》，《时事新报》1935年9月1日。

⑲ 周立波《詹姆斯·乔易斯》，《申报·自由谈》1935年5月6日。

⑳ 周立波《观察》，《读书生活》二卷八期。

㉑㉒ 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大晚报》1934年12月31日。